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庄方域

散文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侯方域

邬国平 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侯方域散文选集 / (清)侯方域著; 邬国平编. —2
版.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散文丛书)
ISBN 7-5306-3253-1

I. 侯... II. ①侯... ②邬... III. 古典散文—作品
集—中国—清代 IV. 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3283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74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2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6.80 元

编辑例言

一、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和诗歌一样,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以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特编辑这套“中国古代散文丛书”,作为“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

二、散文文体范围,代有嬗变,古今不同。本丛书所选,以抒情、记述体等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为主。入选作家上起自先秦,下迄于清代。按不同作家分别成册。各书篇目排次,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以便读者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演变轨迹。

三、本丛书每书分两部分:一为论文,内容除简介作者生平、文学活动外,着重结合选入本书的作品,分析、评述其散文创作思想特别是艺术特色、散文创作发展历程及影响。一为散文,每篇均附加题解、注释。

四、论文部分力图与散文部分互补共济,以论文帮助

读者对所选散文提高到理性认识,又以所选散文来深化读者对论文的感性认识,两相印证,使本丛书除选注散文佳作供阅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作家论乃至古代散文史的作用,既不同于一般散文选本,也有异于一般的古代散文史而自具独有的特色。

五、每书所选散文,除了作者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外,还照顾到作者不同时期、不同题材、风格的文学性散文,以便体现作者散文创作发展道路。

六、题解除解释文题中有关词语、专门名词等和说明写作时间、出处、版本等外,还对作品写作背景、思想价值、艺术特色以至艺术手法等,加以简明的评述。

七、注释以疏解难字、难词以及典故、职官、器物、人名、地名等为主。对其重要者、用法特殊者,并援引出处或例句,以便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百花文艺出版社

侯方域和他的散文

邬国平

生活中,当人们蓦然回首往事,所得到的感觉并不相同,有的为从前做过的事情而产生愧悔之意,有的则又对以往的经历产生怀念之情。侯方域三十五岁那年对自己做了一次深刻全面的反思,内心凄迷,充满矛盾,既后悔从前的错失,又对过去的生活忆绪重重,排遣不尽。他分别以“壮悔堂”和“四忆堂”命名二室,并以之作为自己文集和诗集的书名,以示对不堪回首而又铭心难忘的故我永久的纪念。

—

侯方域字朝宗,号雪苑,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出生于河南商丘一个世宦之家。祖父官太常卿;父亲中进士后,时在京师任职,后累官至户部尚书;叔父与父亲同榜

进士，后累官南京国子监祭酒。总之，这是一个既有宦族气派、又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家庭。其实，他家始祖在明初隶属“戍籍”，地位很低，直到曾祖父一辈，依靠力学才逐渐发达。因此自伯曾祖后，“吾戍籍也，尔不力学，将为伍卒矣”这句话就成了侯氏家族督促其后代努力上进的家训，而侯方域的祖父、父亲和叔父也都是在这条垂训的激励下，步步攀升为显贵，赢得声誉的。对此，侯方域在《赠季弟序》中不无自豪地做了叙述。

作为世家子弟，侯方域自小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轻快自在，颇少拘束。当然，他也被要求勤奋读书，接受家训的管束。但他生性好动贪玩，读书不能算很用功，只是因为天生聪明，颖悟善解，所以对功课不仅能应付自如，还往往在同学中名列前茅，令不少人羡慕。

侯方域的父亲爱好戏曲，蓄有家乐，有时甚至让演员跟随自己入朝，观察朝臣“贤奸忠佞之状，一切效之，排场取神似逼真，以为笑噱”（胡介祉《侯朝宗公子传》）。长期受家庭的熏染，侯方域自小也喜爱看戏听曲，读书时经常逃课，外出“选伎征歌”；长大后，更是经常出入于歌舞场所，特别是在以歌舞繁华著称的南京期间，更是如此，几乎每次宴饮，都离不开歌妓侑酒。据江藩《黄宗羲传》载：“在南都时，见归德侯朝宗每宴以伎侑酒，宗羲曰：‘朝宗之尊人尚在狱中，而放诞如此，吾辈不言，是损友也。’”久而久之，侯方域亦谙于按谱辨音，往往令梨园老弟子叹服（胡介祉《侯朝宗公子传》）。以听曲观戏为纽带，侯方域接触了许多伶人歌妓，对他（她）们的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有较多真切的了解。尤其是与李香君所建立的亲密关系，对侯

方域的思想、生活和行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这些又直接导致了他的以描写伶人歌妓为题材的几篇著名的散文，如《赠江伶序》、《李姬传》、《马伶传》等的诞生。

明代自神宗皇帝即位后，政治更加黑暗，百姓不堪重重盘剥，纷纷竖起义旗。北方与明朝分庭抗礼的一些少数民族贵族集团自恃强悍，时常挑起争端，边疆狼烟四起，连绵不绝。朝廷内部四分五裂，党派壁垒森严，各自分疆而立，矛盾尖锐，争斗激烈，威势彼此轮转。在诸多党派中，东林党相对来说比较正直，受清议支持，其反对党尤其是阉党，则多卑污势利小人。侯方域的祖父、父亲和叔父皆倾向于东林党，敢于持议，颇有清望，因此在宦场屡遭挫折。这些国事、家事都给侯方域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从小形成了以上述党派之争为主要判断依据的爱憎观念，并成为左右他未来人生历程的重要因素。

十六七岁时，侯方域因父亲在京做官，也随之来北京读书、生活。胡介祉在《侯朝宗公子传》一文中称：“方域生有异质，侍父京师，多为贤公卿所赏识，谓强记可比汉张安世，干局可比唐李文饶，足称膏饬才子。”此时他已具备了独立判断时势的能力，加之见识增多，往往好发惊人之论。如说：“天下且乱，所见卿大夫，殊无足以佐中兴者，其殆不救乎！”（引自贾开宗《侯朝宗传》）不久明朝灭亡，事态发展果然不出他所预料。可见其虽少年疏狂，立言却并不轻率。

崇祯十二年（1639），侯方域气盛志高，赴金陵参加南雍秋试。这是一次表现才华、结纳名流的绝好机会。侯方域与人登金山，俯仰慷慨，历论古今，臧否人物，有极目

神州、舍我谁济的浩叹，引起同行友人的强烈共鸣，人有周瑜、王猛之目。“恍荡任侠使气，好大言，遇人不肯平视；然一语合，辄吐出肺肝，誉之不容口。振友人之厄，不吝千金；然亦喜睚眦报复。”（邵长蘅《侯方域传》）是个敢爱敢恨、性情真率的青年狂士。正是这次金陵之行，他与陈贞慧、方以智、冒襄结下了深厚友谊，世称“复社四公子”。而他与阮大铖结怨也始于此时。阮大铖因依附阉党，不齿于清流，原想趁侯方域来金陵之际，利用与其世交关系，求他从中调停，与南京清议和解，却遭到侯方域严厉拒绝。阮大铖怀恨在心，为后来他得志掌权、欲置侯方域于死地埋下了祸因。如果说在此以前侯方域虽然关心政坛，毕竟还是一个局外人，那么自此以后，他已被卷入党争的漩涡之中。这次考试，他举南雍第三人，以策语触讳遭黜，可谓一无所获；然而他在士人心目中，已是一位集文章、气节、经济于一身的文坛新星。他后来写的许多散文，都与这段时期的生活和交游有关，如《答田中丞书》、《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以及于回忆与陈贞慧、方以智、冒襄等人交往和友谊的文章。这些都足以说明，此次金陵之行在侯方域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创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后，他依然读书写作，四出交游，高谈阔论，生活还算过得平静。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商丘，不久又占领北京；接着清军入关，长驱江南，取明而代之。侯方域只好在河南、江浙一带流亡奔走，数度陷于不测，终又化险为夷。这期间，他曾为奉命督师的父亲和一些藩镇将领出谋献策，企图挽回一些颓

势,但是都未被采纳,只好快快作罢。

怀着失志和失落的情绪,侯方域步入了清朝。他感到无所作为,于是重新组织起中断了数年活动的“雪苑社”,与家乡文士一起吟诗作文,饮酒听曲,借以消磨时光。他有时也到江南走走,见一见老朋友,抒发一番沧海桑田的感慨,以寄托故国黍离之思。在此期间,他的才华依然不减当年,时时喷涌而出。“末年游吴下,将刊集,集中文未脱稿者,一夕补缀立就,人益奇之。”(邵长蘅《侯方域传》)

值得提到的一件事是,顺治八年(1651),侯方域参加了河南乡试,举第一,主司者听信妒嫉者蜚语,将其置于副榜。时人和后人大都认为这是侯方域的失节。不过也有不同看法,如侯洵《侯朝宗年谱》顺治八年谱载:“当事欲案治公(指侯方域),以及于司徒公(指侯方域之父侯恂)者,有司趋应省试,方解。”认为侯方域是受到胁迫才不得不应试。朱凤起在“万有文库本”《侯方域文·序言》中也认为侯方域“去应乡试”乃是“受当道的逼迫”。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编,由黄钧、周寅宾、龙散牧执笔的《中国历代作家小传·侯方域》亦持此观点,指出“当事”之所以“欲案治公,以及于司徒公者”,是因为“清廷怀疑他们与江南的反清力量暗通声气”,“侯方域正是这种情况下,不得已才参加了河南乡试,得中副榜”。孰是孰非,侯氏文章俱在,“言为心声”,可作为参考。考试受挫抑后,他写了一篇《赠徐子序》谈到自己的心情:“君子忧夫道之不彰,不忧夫身之不遇。”口气显得较为轻松,似乎并不以为这是一次值得计较的事情。这比起崇

祯十二年他被黜返乡、自况高阳酒徒的愤世嫉俗(见《送徐吴二子序》),不可同日而语,毕竟两次应试的客观背景和主观情绪都是大不相同的。从他以后写的一些文章来看,如《与吴骏公书》劝说吴伟业“坚塞两耳”,拒绝清廷的征聘,不与新入主的统治者合作,“奈何以转眼浮云,丧吾故我”!言辞恳切,态度鲜明,情绪激昂;《与槁木大师书》、《与方密之书》盛赞道友入清后削发出家,以“捐舍”求“建竖”的“英雄根器”;《书练贞吉日记后》对降清的钱谦益竭尽讽刺嘲谑。这些文章都流露出强烈的遗民意识,表明侯方域入清以后,在情绪上与清王朝基本上处于一种不妥协状态。指出这一点,对于阅读和理解他的散文将是有益的。

顺治十一年(1654)冬,侯方域因病去世,享年仅三十七岁,是中国古代比较著名的英年早逝的文学家之一。

二

侯方域喜欢写诗,也爱作古文,然而他的诗歌不如古文名声远扬。

由于受到社会时尚的影响,加上宦族弟子读书习文都带有鲜明的功名目的,因此侯方域最早是以揣摩八股文来开始其写作生涯的。八股文虽是一种代圣人立言的应制文体,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多严格限制,如果细加鉴识,仍然可以发现,这类文章也有相对的自然灵动与拘滞呆板之别。侯方域少时曾从倪元璐学文,倪氏告之以写制艺的要领:“必先驰骋纵横,务尽其才,而后轨于法。”

(侯方域《倪涵谷文序》)强调作文骋才先于就法,反对以法束才,这被侯方域终身奉为写作的信条,不仅对他的时文,而且对他的古文创作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明末,六朝美文再次受到文人青睐,骈俪文体经过长期沉寂之后,又得以重新抬头。侯方域早年除了较多写作时文外,还经常习摹六朝文笔,借骈体以抒发才情,而当时他对唐宋古文的价值还认识不足。《楼山堂遗集序》说:“吴子(应箕)尝云:‘文章自韩、欧、苏没后,几失其传,吾之文足起而续之。’余时方汨没于六朝,不知其善,亦不取视也。今知之,欲与之言,而吴子死久矣。”这篇序为其晚年所写,从他的自述可以体会出他对自己早年追摹六朝文风的痛悔心情。他现存的散文多写于确定宗尚唐宋古文之后,具有六朝美文风格的早年之作被他自己删除殆尽,因而已经无法窥见其原貌。《新迁颜鲁公碑记》、《梅宣城诗序》、《曼翁诗序》等文作于明亡之前,注重典实,辞采华丽,韵致清美,较多整饬之句,尚能反映他早期文章的某些特点。徐作肃于《曼翁诗序》一文后评道:“此与《梅序》(即《梅宣城诗序》)皆朝宗(崇祯)十五年旧作。余从其焚弃之余,特为检出,以识文体之变,亦以其气韵生动,不为风华所掩也。”本书选录这三篇文章,以见他早期散文创作风格之一斑。

侯方域文章中最负盛名的是他在继承唐宋古文传统的基础上所写的作品,其中名篇最多,为他赢得了清初散文名家的声誉。他由学六朝到学唐宋的转变大致比较明显地出现在明朝灭亡前的最后几年中。在此之前,他既作骈体,也写古文,并好汲骈入散。入清以后,就开始专

注于唐宋古文传统,对六朝文风在整体上采取批评态度,抛弃了自己早年的骈俪之作。徐作肃在写于顺治九年(1652)的《壮悔堂文集序》中谈到:“侯子十年前,尝出为整丽之作,而近乃大毁其向文,求所为韩、柳、苏、曾、王诸公以几于司马迁者,而肆力焉。”这大致可信。侯方域为什么最终将自己的散文创作归向唐宋古文一路呢?答案可以从他对先秦、六朝、唐宋文章的看法中找到。他用兵戎作比喻,认为六朝选体之文,“士虽多而将器”,虽然在“小小行阵”方面能够“遥相照应”,尚有可取,但却难以“摧锋陷敌”,不足与犹如“牙队健儿”的秦汉、唐宋古文相比。骈文通篇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谐调,注重藻饰和用典,相对于长短错落的散行单句古文,形式的束缚比较突出。侯方域作文喜欢以才馥法,驰骋纵横,不受框束,好以淋漓酣畅之笔揭发丑恶,抨击时弊,用惟妙惟肖的语言摹画形象,状写世情。这些是他成为成熟的散文作家以后所形成的创作特点。显然,比较自由随意的古文形式更适合于他的创作个性,更便于他艺术才具的充分发挥。在历代古文中,侯方域认为,先秦文章“敛气于骨”,表现为“主骨”的特点,“如泰华三峰,直与天接”。指其文意张厉发露,风格奇峭伟耸,著作的整体感强。两汉、唐宋古文“运骨于气”,表现为“主气”的特点,“如纵舟长江、大海间,其中烟屿星岛,往往可自成一都会,即飓风忽起,波涛万状,东汨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舵覘星,立意不乱,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指出两汉、唐宋古文,其文意包融于文气之中,吐纳舒卷,景象万千,大而可成鸿篇巨制,小也不失圆巧玲珑。唐宋

古文尤其如此。所以侯方域主张以唐宋八大家为问津之筏、奋飞之翼(以上见《与任王谷论文书》)。在实际创作中,他尤以受苏洵、苏轼的影响为甚。对苏洵之文,他以“风行水上”为喻,奉为天下至文,和对苏轼“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诸说,终身感佩不忘。这是他创作古文之宗趣所在,与明代唐宋派较为契近,而明显区别于前后七子对诘屈聱牙、艰深难诂的秦汉之文的向慕和倡扬。

三

纵观侯方域的散文,他对人世事理的关心远甚于对物色景致的留意。他的一生虽然短促,足迹所涉却颇为广阔,“游两都,历边塞,浮江淮,尽吴越”(徐作肃《壮悔堂文集序》)。具有这么丰富的阅历,又处于明清之际游记盛行的创作风气之下,理应会用相当的篇幅来摹绘或清幽秀美、或壮丽雄浑的山川风光、名胜景观。然而侯方域文集中几乎没有专门的写景之作,即使少量几篇记叙园楼题材的文章,如《郑氏东园记》、《云起楼记》等,景物描写也明显地居于次要地位。前者主要围绕园主三易,慨叹世事兴废,否定妖祥凶吉种种流言;后者则着重由目睹物是人非而唤起对达观之境的哲理思考。在这类文章中,景物描写所占的比重极其微末,作者取材于景物,仅仅是作为对事理提出个人心得的一种引子或借口,景物本身在文章中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功效。

出现上述情况,可能与侯方域晚年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删削整理有一定关系,从而使一部分写景之作遭致黜

弃。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导致他文集中写景篇目少到如此地步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如果他早年确实爱写游记,好摹景绘色,晚年缘何惟独对这类题材的作品予以大量删削,不愿它们流传人世?这显然是难以解释的。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侯方域原本写景之作就较少,而将创作精力主要集中于刻画人世间的众生相,阐发自然、人生和社会诸般事理,表达政见。他的游历之于散文创作的积极影响,人文因素远甚于自然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大大扩充并丰富了文章的社会内容,并使作品讽世挹政的涵义得以深化。诚如徐作肃所说:“观览人物之盛,所涉者多,则所得于事与理者益精。理足乎中而充其外,知与古作者发明矣。”(《壮悔堂文集序》)任元祥也认为,侯方域的文章“流连感慨,于世道人心之际,未尝不三致意焉。”(任元祥《侯朝宗遗稿序》)这些评判,皆得要领。而侯方域散文的艺术生命,正是根植于作者对人情事理执著的探究之中。

四

侯方域是以散文摹画人物形象的高手,他的人物传记散文在诸体文章中异彩夺目,人有侯氏文章“叙传最长”之评(见日本安艺赖襄《书侯方域集后》)。这可以《李姬传》、《马伶传》、《贾生传》、《司成公家传》、《任源邃传》、《祭吴次尾文》、《郭老仆墓志铭》等文为代表。这些文章的传主,有作者的叔父、亲交、文友、家仆,都是他所熟知的人物;有些作者笔下的人物,虽然没有与作者发生过直

接交往,文章素材主要来自传主亲人的讲述(如《任源邃传》),以及其他途径的传闻或纯凭虚构(如《马伶传》。前人或认为这是一篇幻设的寓言体传记),由于作者对抗清殉难的志士仁人和普通演员的生活相当了解,故叙写这类人物颇能驾轻就熟,文章真切感人。这些优秀传记散文的主角大都是下层平民百姓,也有落魄失志的文人和刚正不阿的朝臣,在他们身上体现着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状况之下人们的正直、善良、忠勇、正义。侯方域为他们立传,讴歌他们的品行,并借以讽刺、鞭挞他们的对立面,由此可以折射出作者的善恶观。

古代史传家提倡简洁精炼的文风,主张用三言两语叙明事情,把无关文章主旨的“水分”文字尽量挤干,其长处是言简意赅。但是片面或一味尚简,也容易产生形象单薄、生动不足的缺憾。侯方域的叙传散文作品大都篇制短小,材料集中,在整体上与简炼的古文传统相吻合,然而他所刻画的人物形象的内涵却相当深刻,给人以血肉丰满的感觉。习常普通的文字,一经他遣用,常常变得生动奇妙,精彩纷呈。

具体一点说,他在写作上常常是大处落墨,即紧扣人物行事大节,着力挖掘并透视出一个人的根本精神内质所在,并借助关键的局部描写,使人物的整体形象得以鲜明、清晰地映现。《司成公家传》着重叙写作者叔父侯恪生前两桩大事:拒绝魏忠贤诱纳、揭发温体仁奸伪。这两件事使侯恪在仕途上一挫再挫,受尽贬抑之苦,然而他在士林的清望也借此得以树立。毫无疑问,这是传主一生的大节所系。作者于这两件事情施以浓墨重彩,着意加

以描写,人物自然也就清晰、完整地留在了读者的印象中。这种写法也同样适用于为平凡百姓立传。李香君是作者亲密的知交,为她写传记,该有许多事情可以记叙,足以写成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然而《李姬传》不足六百字,作者集中笔墨写她对阉党徐孽阴谋的先见之明,规劝作者拒绝阮大铖的利诱,不为其所用,同时又刻画了她反抗权贵、忠于爱情的刚烈坚贞的品格,在古代散文史上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深明大义烟花女子形象。《郭老仆墓志铭》记作者家中一位义仆。此人一生平淡无奇,然而当作者父亲被诬下狱,“亲朋、奴仆往往避匿去”之际,郭老仆忠诚、正直、善良的人性却借这场突如其来的危难得以充分的展示。他戒掉了嗜之如命的杯中物,收敛起贪玩、不务正业的习性,侍候主人“于狱者七年”,受尽羞辱,在所不辞。作者正是在这一关键的情节上做足文章,笔下的人物顿然光彩四溢。《马伶传》、《贾生传》、《任源邃传》等文,尽管记叙的人物、事迹各异,大处落墨的写法却大体相似。

精选典型的题材,从大处落墨刻画人物,这主要是指从结构框架方面保证文章简洁有度。就对内容的具体叙写而言,侯方域则是运笔不嫌微细,该详则详,完全以写出人物鲜明的性格、追求生动传神、笔墨风趣、实现高度的文学审美性为创作宗旨,并非唯简是从。这是他与一些片面强调简要的古文家不甚相同之处。他曾将自己对古文写作艺术的理解表述如下:

行文之旨,全在裁制,无论细大,皆可驱遣。当